

礼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与东亚古典舞范式的建构

孙 艺

[摘要] 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要素，周代雅乐舞在东亚文化体系与现代艺术实践中具有多重意义与持续生命力，在现代艺术实践中发挥着连接传统与全球化的作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身体规训展现社会秩序与政治伦理，对东亚古典舞体系的建构影响深远。通过历史考察与跨文化比较，系统梳理周代雅乐舞在周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及其身体语法特征，分析周代雅乐舞在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演变与再创造过程。此外，结合当代数字技术与批判性编舞理论，审视周代雅乐舞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构与再诠释，揭示传统礼制舞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路径。

[关键词] 周代雅乐舞；礼乐制度；身体规训；舞蹈体系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3-0162-07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3.19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度程式化、强调仪式感的舞蹈艺术形式，具有严格的动作规范、整齐的队列、圆润的动作轨迹和优雅庄重的舞姿。它不仅承载了深厚的政治象征与审美规范，还通过高度程式化的身体语言体现了礼乐制度规范的社会秩序与等级结构，更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原礼乐文化的传播，周代雅乐舞通过多种路径进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成为东亚古典舞体系构建的范式原型之一。各国在接收与转译过程中对周代雅乐舞的动作体系、仪式逻辑和礼制内涵进行了本土化重构，展现了礼乐文化的共性传播与地域性变异的互动格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当代语境中，周代雅乐舞的身体规训系统与礼制语义正在接受新的解读与重构。现代编舞理论、动作考古学和数字媒介的介入，不仅使传统礼制舞蹈获得新的视觉形态与传播路径，也推动其文化意义不断被

批判性阐释。周代雅乐舞不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世界的文化桥梁。本文旨在通过身体符号学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系统梳理周代雅乐舞的礼制机制、身体规训逻辑及其在东亚文化中的范式转译过程，探讨其在现代艺术与数字媒介中的再创造实践，揭示传统礼制舞蹈在历史演化与当代表达中的多重生命力与当代价值。

一、周代雅乐舞与礼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

（一）周代雅乐舞的社会功能与礼制体系

周代雅乐舞不仅是周代政治合法性的展示工具，还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部分。周代雅乐舞以其高度仪式化的形式，将周代的社会等级、政治权力以及伦理道德具象化，成为表达统治与天地神明关系的独特文化载体。^[1]在这种文化形式中，身体规训（即身体语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角色。它通过严格规定的舞蹈动作、队列和节奏体系，生动地展现了“礼”这一礼制的核心思想，将抽象的伦理规范与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呈现的身体表现形式。

周代雅乐舞起源于西周初年，是“礼乐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审美化的舞蹈艺术，更是承载政治合法性与伦理规范性的制度工具。作为国家典礼的核心形式，周代雅乐舞体现了以“礼”统纲、以“乐”合众的社会治理逻辑，在《礼记》《周礼》等典籍中均有严格记载。周代雅乐舞的本质不仅是审美展演，更是一种将“王权—秩序—身体”统一的政治表现形态。王克芬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中指出：“雅乐舞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是宗教祭祀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体现。”^[2]

周代的礼乐制度强调通过重复性、规范化的身体实践，达成对社会等级、政治结构的认同与内化。周代雅乐舞正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体现之一：舞者以特定的队列结构（如八佾制）、动作幅度、节奏控制来区分君臣贵贱，每一步法、每一肢体轨迹都隐含了权力编码与伦理秩序。礼乐制度不仅体现为外在的典章仪轨，更通过反复实践“形于身体”，内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与心志认同。这种由外而内、身心合一的浸润，使其超越表面规范，成为深植于文化心理的制度精神，维系社会的持久整合与文明传承。

这类形式化的舞蹈语言不仅在中国维系等级秩序，还在东亚诸国的宫廷舞蹈体系中形成了深远影响。如日本的“舞乐”制度延续了唐代输入的乐舞同步观理念；朝鲜宗庙佾舞承袭了《周礼》佾舞的核心礼制逻辑，历史上曾采用四佾、六佾、八佾的阶层结构；越南阮朝宫廷雅乐礼仪以源自中国的雅乐体系为基底，其色彩与服饰设计体现了中原礼制的观念。雅乐在东亚的传播，本质上是礼乐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观的整体传递。其中，舞蹈作为“制度性身体”的实践形态，将抽象的礼仪规范转化为严格的身体动作与队列程式。雅

乐的流动，实则通过这种制度性身体的塑造，完成礼乐精神从形式到内核的跨文化扎根。

通过舞蹈的“制度性身体表演”，周代社会成员在仪式过程中不仅被动观看，更通过参与和模仿，主动将等级伦理与秩序理念内化于身体中，实现了文化意义的身体认同。这种“身体即制度”的艺术形态，在当代舞蹈人类学与文化符号学中，常被视为古代东亚文化“政—礼—艺”三位一体结构的范式起源。

（二）身体规训与“礼”的文化内涵

在周代雅乐舞中，身体规训是核心要素之一，它不仅体现在技术规范上，更承载了伦理秩序与社会等级的象征意义。首先，队列设计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色。“八佾制”严格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舞者在空间位置与队列结构中体现其身份，身体因此成为权力关系的可视化媒介。其次，动作幅度与力度的控制也体现了礼制的内涵。天子的动作庄重有力，以彰显威严；士人动作简约含蓄，表现谦恭与节制，不同动作风格正是对社会角色和伦理期待的身体表达。再次，节奏系统“五步七声”将宇宙秩序转译为身体律动，通过与阴阳五行、四季更替的节拍相呼应，使舞者在表演中实现与“天道”一致的身体表现。周代雅乐舞的身体规训机制不仅维系着古代礼乐制度的秩序体系，也构成了中国古典舞身体范式的逻辑。

（三）身体与政治伦理的关系

周代雅乐舞中的身体规训，不仅体现了舞蹈动作对身体的约束，更体现了一种政治伦理。舞蹈中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政治和伦理的隐喻，是对天子、诸侯及百姓之间政治关系的具象化表达。通过对身体的规范和训练，周代雅乐舞将抽象的伦理道德转化为具体的身体实践，展现了礼制的权威。如在周代的礼制中，“克己复礼”的精神被视为君子应有的德行，周代雅乐舞中的动作便是对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舞者通过克制自己的身体动作，保持舞蹈中的节制与精确，传达了天子应具有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感。天子通过舞蹈展示“上天”与“下民”之间的联系，强调自身的君权

神授,而臣子则通过舞蹈体现对其的忠诚与尊敬。

此外,周代的“礼”不仅是社交场合中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周代雅乐舞作为礼制的一部分,通过身体的动作、节奏和空间的排列,将社会中的“礼”制度具体化,形成了一种由上至下、由内至外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身体不仅是表达个体情感和艺术审美的载体,也是社会等级和政治伦理的一种传递媒介。

(四) 美学与身体的统一

周代雅乐舞的身体规训不仅是政治与伦理的体现,还是周代美学的具象表现。周代美学强调的是“中和”与“和谐”,不仅体现在音乐和礼仪上,更通过身体动作和舞蹈的形式展现出来。舞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都是对“中和”理念的表达。

在周代雅乐舞中,舞者的动作要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动作的力度与节奏要与自然的规律保持一致。因此,舞者的身体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表现工具,而是整个宇宙秩序的微观反映。通过对身体动作的严格训练和规范,舞蹈成为对天地、宇宙和社会秩序的再现。

周代雅乐舞的美学不仅关注动作本身的形式美,还强调动作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意义。舞蹈中的每个动作和步伐都是对“礼”与“政”的崇高象征。在这套身体语法中,礼制、伦理、政治与美学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而精致的文化体系。

二、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传播与东亚舞蹈体系的再创造

(一) 日本能乐的“幽玄”凝缩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核心象征,自秦汉以来便随着丝绸之路、朝贡体系等跨文化交流机制传播至东亚多国,并经历了多层次的吸收与再造。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仅在宫廷仪制上接纳了周代雅乐舞的结构样态,更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依据本土的审美传统与宗教哲思,对周代雅乐舞的“礼—乐—形—神”结构

进行了再创造。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礼乐制度的传播力,也展现了地方文化对其内核的再阐释与转译能力。

在日本,能乐的形成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自遣唐使制度确立以来,大量乐舞文化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宫廷在吸收中原“乐舞并举”的典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身的雅乐与能乐体系。日本雅乐体系中保留的源自唐代的《兰陵王》《甘州》《春莺啭》等曲目,皆属偏于柔婉抒情的“软舞”系统,而风格刚健的“健舞”则相对较少传承,体现出日本对中原舞蹈美学的选择性吸收。^[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能乐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礼仪性的结构与队列逻辑,但在具体舞蹈表演形态上却更趋向静谧与抽象。与周代舞蹈追求的“中正大气”不同,能乐强调“幽玄”之美,强调留白、含蓄、凝练。其舞者动作极简,往往通过细微的步法、缓慢的抬手动作来传达情感与氛围;舞台空间亦极为克制,面具的使用则进一步强化了象征性与非写实性,使舞者成为仪式中神圣意涵的承载体。这种舞蹈表演方式在精神气质上虽与《礼记》所强调的“目极北辰而不仰”一脉相承,但其审美走向却从外显的威仪转向了内敛的冥想,更加贴近禅宗强调的“无为”“空寂”。

以《翁》舞为例,舞者佩戴面具,动作节制,静中有动。舞台之上的凝视、缓步、止动之间,形成一种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动中有静、静中藏意”,这正是能乐将中国古代礼乐系统转译为“日本式舞台精神空间”的典型体现。这种美学重构不是对原型的背离,而是对其精神逻辑的延伸与重构,呈现中华礼乐体系的生命力与适应力。

(二) 朝鲜佾舞的“闲丽”呼吸控制

朝鲜的佾舞是周代雅乐舞在朝鲜文化中的继承与变异。佾舞在朝鲜的宫廷礼仪和宗庙祭祀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从周代雅乐舞中汲取了精华,并根据朝鲜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审美取向,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在朝鲜佾舞中,“闲丽”风格的出现是对周代雅乐舞的一个重要再创造。^[4]

“闲丽”风格强调舞者动作的缓慢、优雅和呼吸的细腻控制。在执行动作时，舞者采用长吸短呼的方式，使整个舞蹈呈现出悠然自得的艺术氛围。这种呼吸控制技巧的引入，使朝鲜佾舞在表现形式上较周代雅乐舞更加内敛与沉静，突出了对节奏和空间的感知，而非强烈的视觉冲击。朝鲜佾舞在形式上与周代雅乐舞中的节奏、动作有所不同，但仍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的“礼”与“政”精神。

同时，朝鲜的佾舞在动作设计上也保留了周代雅乐舞对“礼”的强调。如在“三献九拜”的仪式舞蹈中，舞者的动作具有明显的程式化，体现了对礼制的尊崇。在道具使用上，朝鲜舞者使用五方色扇（青、赤、黄、白、黑）表示五行元素，并且每种颜色的扇子都与特定的美德相对应，象征“仁”“礼”“智”“信”和“义”。这些符号的使用将周代雅乐舞的礼制符号转化为本土文化的象征，形成了朝鲜独有的舞蹈文化表达。

（三）越南雅乐舞的“螺钿”韵律重组

越南的雅乐舞是在周代雅乐舞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在黎朝时期，雅乐作为越南宫廷音乐和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仪式和祭祀的重要艺术形式。然而，越南的雅乐舞在继承周代雅乐舞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本土舞蹈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律和表现形式的“螺钿”韵律。^[5]

“螺钿”韵律在越南雅乐舞中表现为通过舞蹈动作的旋转和膝部的转动，舞者的身体韵律更加流畅和富有变化。与周代雅乐舞中严格的节奏和动作幅度不同，越南雅乐舞在韵律上更注重身体的自由表达。通过螺旋转膝等动作，形成了一种柔和而富有层次感的舞蹈风格。这种舞蹈风格不仅是对周代雅乐舞动作的简单复制，它还体现了越南舞蹈文化对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并在细节上充分融入了本土化的韵律。

此外，越南雅乐舞在道具的使用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在传统的雅乐舞中，羽籥是重要的道具之一，而在越南雅乐舞中，羽籥被替换为铜钱剑，这一变动不仅是材料的替换，更带有象征

意义。铜钱剑不仅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礼制”符号的精神，同时也象征越南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独立。铜钱作为财富和贸易的象征，反映了越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显示出周代雅乐舞在越南文化中的本土化演绎。

（四）文化转译中的共性与差异

通过对日本能乐、朝鲜佾舞和越南雅乐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周代雅乐舞在东亚各国的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各国的文化背景和艺术需求进行了再创造。这一再创造不仅体现在舞蹈形式的改变，更体现在礼制符号和伦理道德的再表达。每个国家在吸收雅乐的过程中，都会将其本土化，并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然而，尽管各国的雅乐舞形式存在诸多差异，但它们仍然保留了周代雅乐舞的核心精神与文化内涵。周代雅乐舞的礼制精神、政治隐喻及身体语法，通过跨文化转译，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转译不仅丰富了东亚的舞蹈体系，也促进了东亚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

因此，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传播与再创造不仅是艺术现象，更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体现。通过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周代雅乐舞在东亚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

三、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影响与东亚古典舞的范式塑造

（一）日本能乐的雅乐舞范式转译与艺术再创造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典范，承载了国家仪制、宗教伦理与美学精神的多重功能，其影响力远超中原本土。经过长期发展，周代雅乐舞逐步演变为更具综合性和艺术表现力的宫廷舞蹈体系。在以朝贡体系、遣唐使制度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跨文化交流机制推动下，周代雅乐舞的舞制与音乐被广泛传播至东亚地区，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宫廷舞蹈传统。这一传播并非单向输入，而是伴随对礼乐制度的重构与美学理念的再编码，最终在多个文化体系中催生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古典舞蹈范式。

以日本能乐为例,其源流可追溯至唐代时期对周代雅乐舞的系统引入。在吸收的过程中,日本并未原样照搬,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精神进行深度转译,逐渐发展为具有强烈本土风格的“幽玄”型仪式舞。能乐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程式化的礼仪结构和象征性动作逻辑,但在动作风格与表现机制上进行了明显的重构。如舞者动作由原本的开合有力转向微动内敛,常采用“隅步”与极简手势进行情绪传达;舞台空间以“空”为主,突出留白与精神冥想;而面具的使用则取代了面部表情,实现了象征化的心理渲染。这一转化体现了日本将“礼”的身体规训逻辑转向“静”的哲思内涵,是对周代雅乐舞外形与精神层面同时进行的本土化重塑。从中日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看,日本对唐代舞蹈的吸收,揭示出周代雅乐舞不仅为东亚诸国提供了制度层面的舞蹈范本,更通过跨文化的深层影响,促成了区域舞蹈体系中“礼制结构+地方美学”的复合型范式建构。日本能乐、朝鲜佾舞、越南雅乐舞等,皆以各自方式回应了周代雅乐舞原型中的“政治秩序性”与“身体规范性”,并通过审美重构实现了民族舞蹈传统的系统化确立。因此,周代雅乐舞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输出形态,也成为东亚古典舞蹈体系生成的文明源点之一。

(二) 朝鲜佾舞的礼制符号再造与“闲丽”风格的形成

朝鲜佾舞是周代雅乐舞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在朝鲜的宫廷礼仪、宗庙祭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佾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雅乐舞在朝鲜的移植,更是在朝鲜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创新与再创造。与周代雅乐舞的节奏性强烈、舞蹈动作充满力量感不同,朝鲜的佾舞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柔和、静谧的“闲丽”风格。

“闲丽”风格强调舞者动作的柔和与优雅,呼吸的控制成为其重要的表现技巧。与周代雅乐舞中节奏紧凑、步伐有力的要求不同,朝鲜佾舞的动作节奏更加缓慢、流畅,舞者在舞蹈中的呼吸

控制尤为重要,采用长吸短呼的方式来保持动作的节奏感与呼吸的和谐。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是对周代雅乐舞中强烈的节奏感和力度的反思,也体现了朝鲜文化中对“闲逸”与内敛美学的追求。

在朝鲜佾舞的表演过程中,服饰和道具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传承角度看,其继承了周代雅乐舞中的礼制符号,特别是在道具的象征意义上融入了本土的文化符号。如五方色扇的使用,这些道具不仅与周代雅乐舞中的礼制符号一脉相承,也根据朝鲜的文化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转译,反映了朝鲜佾舞在保持传统礼制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和创新。

(三) 越南雅乐舞的“螺钿”韵律重组与地方文化的融合

越南雅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周代雅乐舞在东南亚地区的跨文化传播与本土化变异。越南雅乐舞不仅继承了周代雅乐舞的基本形式和礼制精神,还在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螺钿”韵律重组。与周代雅乐舞的节奏与队列结构相比,越南雅乐舞在动作的表现上更加自由和富有变异性。

越南雅乐舞特别注重舞蹈动作中的旋转与膝部的转动,形成了类似“螺旋转膝”的独特动作风格。这种风格的引入使越南雅乐舞的韵律更加流畅,动作的表现也更加富有层次感。这一改动不仅是越南雅乐舞对周代雅乐舞节奏模式的创新,更是对舞蹈风格的吸收和融合,体现了越南传统舞蹈的韵律感和自然美。

此外,越南雅乐舞在道具使用上也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越南雅乐舞用铜钱剑替代了周代雅乐舞中的羽箭,不仅保持了雅乐舞中“礼制”符号的象征意义,还加入了越南本土的文化符号。铜钱作为象征财富与贸易的符号,反映了越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贸易文化的影响。通过这种道具和符号的转化,越南雅乐舞不仅延续了周代雅乐舞的礼制符号,也融入了越南本土的经济和文化特征,进一步体现了周代雅乐舞在跨文化转译过程中的本土化与变异。

（四）文化转译中的普遍性与地方性

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对雅乐舞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本土化调整，既保留了周代雅乐舞的核心精神，也在动作、节奏、礼制符号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演绎。

尽管各国的雅乐舞形式存在差异，它们仍共同体现了周代雅乐舞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礼制符号和社会等级的表达上。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影响不仅反映了它作为文化载体的普遍性，也揭示了不同文化如何通过对礼乐体系的吸收与转化，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舞蹈范式。这种文化转译的过程，不仅加深了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东亚古典舞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6]

四、周代雅乐舞的现代性解码与数字技术的批判性重构

（一）数字技术对雅乐舞的再创造与再现

在全球化与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礼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逻辑被重新演绎。雅乐舞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礼仪动作、队列结构与道具符号都通过新技术获得再现与重构的可能。

虚拟现实（VR）、动作捕捉与三维建模等手段为礼制舞蹈的数字化提供了支持。如在佾舞复原过程中，清华大学通过精密数据模拟八佾舞队列，呈现礼乐身体范式的三维结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借助LED地屏技术呈现中国古代文明意象。

在东亚地区，围绕古典舞的数字化实践也日益多元。韩国国家文化财研究所主导的“宗庙祭礼乐复原项目”将“三献九拜”的佾舞通过动作捕捉与360度影像建模系统，展现于博物馆与线上虚拟空间，增强了祭礼舞在数字场域中的文化生命力；日本“国立能乐堂数字化典藏计划”则通过AI行为识别技术优化重现舞者的空间动线，形成了表演行为在当代表达中的数据轨迹。越南相关机构近年来推进宫廷雅乐的音视频采集工程，

结合雅乐遗存与本土表演习俗，建立了数字化的礼舞复原模式。

这些跨国实践共同构成了“身体—制度—媒介”三元关系在数字技术嵌入下的重构逻辑，显示出周代雅乐舞身体范式在东亚古典舞范式重建与文化再生中的区域联动效应。

（二）批判性编舞与动作考古学

在数字媒介与跨文化理论广泛介入的背景下，批判性编舞和动作考古学成为雅乐舞再构的重要路径。批判性编舞作为挑战既定身体规训系统的艺术方法，不仅重新拆解古典舞的动作逻辑，也揭示其中隐含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如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跨界创作项目《九歌》利用Kinect传感器捕捉祭祀动作，生成“数字巫祝”形象，不仅复原传统礼舞动作，还通过虚拟舞台中的行为再现引发对当代身体伦理与权力关系的反思。在台湾地区高校的舞蹈编创教学中，实践者将动作田野调研与文献图谱分析引入课堂，将周代舞谱动作结构转译为当代表达系统，并在剧场演出中解构其等级序列。

东南亚国家也呈现对礼舞传统的重视倾向。越南诸多的青年舞蹈团体在创作中常引入祭祀礼舞与当代街舞动作，通过节奏冲突、队列打散等手法，表现年轻世代对传统仪式性身体规训的审视与创新表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华族礼乐舞体验工程”中，当地编舞者结合多民族礼仪动作元素，对汉传礼舞中的“抬首”“拱手”等结构性动作进行融合与改编，提出了以“礼的交错”代替“礼的等级”的身体编排逻辑。此外，日本舞蹈艺术家与能乐编舞家合作，将古典礼舞元素置于身体实验性剧场之中，借助AI舞谱与声光反馈技术生成“干舞—默剧”交互模式。这些跨国实践表明，批判性编舞不仅扩展了礼舞的表达维度，也将“身体—制度—权力”的三角关系导入技术场域与区域文化交流中，推动礼乐传统与媒介表达、当代表达之间的深层互动。

（三）性别话语的突围与雅乐舞的现代性解构
周代雅乐舞作为一种礼制化的身体语言，其

内在的性别规范和社会角色的分配，往往带有明显的传统性别压制特征。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舞蹈一般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在舞蹈中的表现往往受限于礼制的框架。然而，随着现代舞蹈的演进和性别理论的兴起，周代雅乐舞中的性别话语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和解构。如舞剧《昭君》通过将周代“干舞”中的武技转化为女性手持琵琶的对抗姿态，挑战了传统舞蹈中的性别规范。在《昭君》中，女性不再是单纯的陪衬者，通过“反弹琵琶”的动作，重构了“发扬蹈厉”的武舞精神，反映了女性力量和独立性在舞蹈中的体现。这种改编不仅使周代雅乐舞中的性别表达得到突破，也为现代观众提供了更多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多维解读。部分舞蹈编创者将京剧的“卧鱼”动作与周代“冕旒执圭”代表的垂直权力符号并置。通过身体倾斜和视线迷离等方式，展示了如何通过身体语言突破传统权力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束缚，赋予古老舞蹈新的意义和自由度。

（四）雅乐舞的符号再生产与文化重构

随着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跨国文化交流的加强，周代雅乐舞的符号系统也在不断重构。在全球化语境下，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了周代雅乐舞新的表达形式和全球传播的可能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舞蹈创作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发布，使周代雅乐舞动作可以被全球观众接触和欣赏。在这一过程中，周代雅乐舞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成了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的工具。如2023年央视春晚的舞蹈节目《锦绣》，以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为原型，通过“垂眸曲臂”的动作群体，将古代仪式中的动作转化为文化自信的肢体隐喻。这一符号再生产不仅使古老的礼乐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独特魅力。

这种符号再生产的过程，不仅是对周代雅乐舞的简单重现，而是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对周代雅乐舞符号的再创造和文化重构。这种文化重构不仅反映了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也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创新和转化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在当代舞蹈研究中，周代雅乐舞以其精致而严谨的动作，彰显了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精髓，成为东亚古典舞蹈范式的重要基石。其优雅的舞姿与严格的身体规训，不仅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更在现代通过批判性重构得以延续与再现。这种重构过程为周代雅乐舞注入了新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数字技术驱动的当代语境中焕发活力。^[7]

参考文献：

- [1][2]王克芬. 中国舞蹈发展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40-41.
- [3]杨秋. 从中日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看日本对唐代舞蹈的吸收[J]. 新疆学刊, 2013(19): 90-91.
- [4]迟凤芝. 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变迁[J]. 黄钟 2007(2): 95-101.
- [5]樊荣. 越南雅乐的历史[J]. 中国音乐, 2007(4): 76-85.
- [6]赵维平. 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雅乐及重建雅乐的思考[J]. 中国音乐, 2011(2): 31-36.
- [7]彭小希, 周怡辰. 入古出新: 从舞作《散乐图》看中国“文物舞蹈”创作理路[J]. 乐府新声, 2023(3): 102-108.